

磁州窑“瓷诗文化”评析

潘军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讲师

位于河北省邯郸市的磁州窑是宋金元时期北方最大和最著名的民间瓷窑，因其所烧瓷器主要供平民百姓所用，故不为当时士大夫阶层赏识。事实上，“磁州窑繁复的装饰工艺，为其他窑系所难以比拟，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中有独特贡献。”^[1]磁州窑瓷艺的闪光点就在于其浓郁的民俗文化气息。其中，在瓷器表面大量书写诗、词、曲、赋等文学内容更可谓空前。这些器表文字大多属于韵文，故将其泛称为诗。瓷与诗是两种别具中国特质的文化产物，磁州窑将二者灵妙地结合起来，演绎了一种独特而丰厚的“瓷诗文化”。它为我们研究民间文学发展史提供了鲜活的资料，也为我们探究特定历史时期的民俗文化展示了一个别样的窗口。

一、磁州窑“瓷诗文化”的文体与题材

磁州窑早期器物上仅用竹签之类工具刻划“福”、“忍”、“福德”、“家国永安”等单字或吉祥语，宋末金初时出现了用毛笔书写的文字，随着白地黑花工艺（在白胎上书写墨字，并罩上玻璃釉）的成熟，各类文学样式竞相出现在瓷器上。

诗：磁州窑器表书写的诗以五言、七言联句、绝句居多，还有少量的律诗。目前所知磁州窑最早书

写诗句的是邯郸武安邑城乡出土的一方北宋后期白地黑花椭圆形枕，其上墨书“欲作高堂（唐）梦，须凭妙枕欵。”（图1）该诗化用楚



图1 北宋白地黑花椭圆形枕

襄王游云梦泽，梦见巫山神女的典故，夸誉枕头的妙用，同时也表明了唐宋人以瓷枕作卧具的生活习惯。再如“白玉非为宝，千金我不须。意念千张纸，心存万卷书”之类诗句在唐代南方的长沙窑和金代北方的磁州窑均有出现，充分表明了封建科举考试背景下各地百姓普遍的价值判断。又如故宫博物院藏金代枕上刻写着《咏瓜》诗一首“绿叶追风长，黄花向日开。香因风里得，甜向苦中来。”该诗托物言志，明白晓畅中深蕴着生活哲理。另如邯郸博物馆藏一方元代枕上墨书“常忆离家日，双亲拂背言。遇桥须下马，有路莫行船。未晚先寻宿，鸡鸣再看天。古来冤枉者，尽在路途边。”（图2）此诗也是民间原创，与唐代孟郊《游子吟》有异曲同工之妙。值得一提的



图2 元代白地黑花方形枕

是陕西省佳县文管处藏元代白釉枕刻划着《黄河诗》一首“群领（岭）空山不段（断）头，东南西北复还流。三穹穴聚鱼千只，九曲能行百万州（舟）。神后浪翻重后土，庙前波汲（及）壮甫（南）州。川（穿）运世界维澜（拦）截，也备江河大海收。黄河诗。”该诗大有李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之势。但李白只是借黄河之水为酒助兴，而该诗则是最早专写黄河的。考察磁州窑器表诗句，合律或基本合律者占大多数，民间制瓷艺人有意无意间在唐宋诗风熏陶下掌握了基本的诗歌创作技巧，足见唐宋时期以格律诗为代表的诗文化的广泛社会影响力。当然，除生发于民间的诗作外，磁州窑工匠们也积极抄录了流行于世的名人诗作，其中尤以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唐人作品居多。“有的诗词在瓷器上反复出现，说明它们在民间的流传程度极为广泛。如白居易的离乱诗，曾在多方瓷枕上出现，寄托了战乱时期人们的思想感情。”^[2]有时民间匠

人也会对名人作加以灵活改造，如上海博物馆一方金代卧婴枕上题写的行草诗句“叶落猿啼霜满天，江边渔夫对愁眠”显然源自唐张继的《枫桥夜泊》（图3）。



图3 金代卧婴枕

词：词在磁州窑器物上也颇多见，特别是书写面积较大的枕上更多。但这些词大都属婉约格调，“缠绵的词韵和柔柔的枕境所形成的一致，成为一种情感，两者互为条件和载体而情韵缭绕。这比单纯从字面上欣赏词或从枕面上单纯地观赏几个字更具观赏美和情韵美。”^[3]磁州窑器物上常见的词牌名有《如梦令》、《满庭芳》、《点绛唇》、《西江月》、《摊破浣溪沙》、《落梅风》、《人月圆》、《月中仙》等。这些词有出自苏轼、柳永、秦观、晁元礼等名家的，但大多数还是来自民间。如日本大阪万野美术馆藏金代梅瓶上墨书《点绛唇》“红杏萋萋，万家装点都门外。曲塘（屈原）何在，香粽年年赛。捧砚佳人，玉腕缠新彩。多娇态，御荷争戴，斜插香枝艾。”生动展现了民间过端午的生活习俗。再如私人藏元代白地黑花枕上书《西江月》：“自从轩辕之后，百灵立下磁窑。于民开国最清高，用尽博士机巧。宽池拆澄尘细，诸般器盒能烧。四方客人尽来掏，件件儿变作经钞。”（图4）



图4 元代白地黑花圆形枕

该词充分体现了磁州窑制瓷艺人的自豪、自信，也表明了磁州窑在民间广受欢迎。又如邯郸峰峰矿区文保所藏金代瓷枕墨书《如梦令》“曾醉桃源西宴，花落水晶宫殿。一枕梦初惊，人世光阴如电。双燕，双燕，不见当年人面。”（图5）此类感叹人生如梦的文字在磁州窑瓷枕上尤为多见。



图5 金代白地黑花椭圆形枕

曲：曲是宋金元时期新兴的流行于市井的文学样式，磁州窑制瓷艺人敏感于斯，并迅速地将它们采撷、装饰于瓷器表面。“目前我们知见的这类出土词曲枕瓶已有20多件，得小令30余首，大都是金元时期流行市井的民间俗曲……这些地下文献不仅可补《全金元词》、《全元散曲》之遗，提供了可供校勘的北曲早期版本，更重要的是为研究北散曲在民间阶段的原始生态和词曲共生与互生的复杂关系及其

传播路径提供了实物标本。”^[4]不知名氏所作的曲令在磁州窑瓷枕装饰中甚多。如“老书生，白屋中，说唐虞，道古风。一朝事业如春梦，不如蓬门闭户教几个小蒙童。忽然喧哗一片，好不觉，金兵到门庭。”该曲真实再现了金兵南侵的历史情景，反映了民不聊生的社会状态。再如邯郸市博物馆藏元代长方形枕上墨书《红绣鞋》曲文“韩信功劳十大，朱阁（诸葛）亮位治（至）三台，百年都向土中埋。邵平瓜，盈亩种；渊明菊，夹篱开。闻安乐，归去来。红绣鞋。”（图6）又如磁县博物馆藏元代长方形枕以行楷书《朝天子》重头曲“得闲，且闲，已过终年限。宁交别人上高竿，却交别他人看。邯郸长安，皆属虚患（幻），论渔樵一话间。江山，自安，那里也唐和



图6 元代白地黑花长方形枕

汉。左难，右难，枉把功名干。烟波名利不如闲，倒大无忧患。积玉堆金，无边无岸，限来时悔后（后悔）晚。病患，过关，谁救的贪心汉。朝天子。漳滨逸人造。”（图7）另如河北省博物馆藏元代长方形枕上书《喜春来》曲文“牡丹初放安排谢，朋友才交准备别，人生一世半痴呆，如梦蝶，不觉日西斜。”（图8）这些曲文大都明显表露着叹世避世，厌却功名，人生苦



图7 元代白地黑花长方形枕

短之情，揭示了在金元异族高压统治下民间的普遍心态。故宫博物馆藏元代瓷枕上题写的一首《小桃红》曲却有所不同，“幸奉佳诞笑



图8 元代白地黑花长方形枕

声喧，喜贺今辰宴。馥郁馨香小庭院，昼楼前，祥云冉冉分明现。南级老人手持丹诏，寿赐一千年。”



图9 元代白地黑花长方形枕

(图9)这或是一件为顾主订烧祝寿求平安之枕。

赋：在瓷器上写赋也最早出现于磁州窑。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藏金代白地黑花长方形枕上墨书《枕赋》一篇“有枕于斯，制大庭之形，含太古之素，产相州之地，中陶人之度，分元之全名，混沌之故。润琼径（瑶）之光辉（辉），屏刺秀（绣）之文具。泥其钧而土其

质，方其样而朽其腹。出虞舜河滨之窑，绝不苦窳。灭伯益文武之火，候以迟速。既入诗家之手，忻（欣）置读书之屋。鄙珊瑚（富）贵之器，陋琥珀华靡之属。远观者疑（凝）神，狎玩者夺目。来尺壁（璧）而不易，贾万金而不粥（鬻）。囊以蜀川之锦，栝以豫章之木。藏之若授圭，出之如执玉。是时也，火炽九天，时惟三伏。开北轩下陈蕃之榻，卧南薰薰春之竹。睡快诗人，凉透仙骨。游黑甜之乡而神清，梦黄粱（梁）之境而兴足。恍惚广寒之宫，依稀冰雪之窟。凜然（皂）发之爽，倏然炎蒸之萧。思圆木警学之勤，乐仲尼曲肱之趣。庶不负大庭太故（古）之物，又岂持（特）不困于烦暑之酷而已也。漳滨逸人制。”（图10）该赋共266字，



图10 金代白地黑花长方形枕

是目前所知瓷枕上书写文字最长者。它将枕的发明、制作、用途、益处以及与枕有关的典故汇集其中，并加以形象的比喻和赞美，堪称枕的一篇传记。

此外，磁州窑器表还有大量的俗语、警句、对联、民谣等，明清时期甚至还在器表书写谜语。它们大多生发于民间，为百姓所喜闻乐见。此处不一一赘述。

二、磁州窑“瓷诗文化”的繁盛原因

“我们依据考古资料知道，在陶瓷器物上书写诗句，属长沙窑首创。”^[5]但是，唐代长沙窑带诗文的器物毕竟相对数量较少，且主要仅是五言诗句（另有极少量的六言、七言诗），而宋以后的磁州窑则在继承前者的基础上将器表诗文的数量、种类、规模推向了空前的新境界。如果说，长沙窑开启了中国“瓷诗文化”的先河，那么，磁州窑则将中国“瓷诗文化”推向了繁盛，其原因主要在于：

（一）物质材料因素：磁州窑制瓷主要采用当地煤系中出产的高岭石质泥岩，胎质普遍较粗，釉面多不够光润，伴有细小棕眼。为弥补这一缺陷，工匠们便多在器胎外壁施一层细白的高粘度化妆土，之后再外罩一层透明釉。这层细白的化妆土犹如在器物表面铺写了一层宣纸，从而为制瓷艺人绘画、书写造就了良好的基础。此外，唐代长沙窑器物题写诗文的主要是盛酒的执壶，因其体量较小，且受执壶表面弧度影响，观赏视角亦有限，故书写面积受限（主要集中在壶嘴下方），书写字数亦不多，而磁州窑器物题写诗文的主要是日常使用的瓷枕，因枕面开阔平坦，周边可用面积也较多，因此更易书写篇幅较长、字数较多的词、曲内容。

（二）文化风尚因素：两宋以来崇文风雅的主流文化影响波及民间审美喜好，题诗作画成为社会时尚。在器物表面刻、写诗文或绘图，使得本来粗俗的民窑器物顿然

提升了文化品位，拓深了文化内涵。诸多磁州窑器物表面抄录书写的著名文人的诗词作品更说明了瓷器作坊对老百姓文化需求心理的把握。唐宋之后，代表士大夫文化的格律诗已过颠峰，而代表市井文化的词、曲兴盛，它们的文化品格更亲近百姓，故更易为百姓喜好。坊间流行甚至纯民间创作的大量词、曲为磁州窑提供了更多体裁与题材的书写素材。

（三）社会政治因素：虽然政权更替，但汉文化不仅没有被金元异族统治消灭，反而以其深厚的底蕴和强大的生命力不断同化着后者。作为汉文化代表的诗文化也因此得以承继、发展。同时，元代阶级统治严酷，停止了科举考试，切断了知识分子晋升上层社会的途径，使大量有才华的汉人知识分子隐逸山林，散落民间。他们完全可能与磁州窑工匠为侣，为磁州窑“瓷诗文化”的发展不断注入催化剂。

（四）地理位置因素：磁州窑地处黄河文化发源地，自古文化昌盛，源远流长。宋元时期又处于汴梁和大都两个文化中心的过渡地带，故该地区百姓更能直接感受时代文化的熏陶，以致制瓷工匠等底层民众都能顺手拈出诗词，寄情抒怀。

三、磁州窑“瓷诗文化”的研究价值

磁州窑器表诗文“对于研究宋金时期民俗、文学、艺术都有它一定的作用，是应当引起重视的有价值的文化遗产。”^[6]笔者认为，其

主要研究价值有：

（一）补充文学发展史资料：磁州窑上始于五代两宋，下续于明清，辉煌时期则在金元，其器表刻、写的诗、词、曲、赋等文学内容大多不载于书籍，但其题材广阔，信息丰富，为我们研究特定时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宋金元时期正值我国词、曲大发展阶段，也是市井文化大批昂首登上历史舞台之际，磁州窑民间“瓷诗文化”正是历史的见证和时代的烙印。从宋金到元明的磁州窑器表文字充分反映了从诗到词、曲的流变发展过程，为我们保留了大量不曾被当时主流文化所记载的民间诗、词、曲作品，还为我们校勘、考证已被记载的文人作品提供了独特的依据。如私家藏金代诗文枕上书“寒食少天色，春风多柳花。倚楼心絮乱，不觉见松鸦。”元蔡松年《水调歌头》前两句“寒食少天色，花柳各春风”显然受此影响；再如北京市文管所藏元代长方形诗枕两端分别题写“枕上鸟声，唤起半窗红日。夏日书”，“楼前桐叶，散为一院青阴。树林居士。”原以为此句出自明代屠隆《娑罗馆清言》卷上，该方元代瓷枕的发现，证明此前就有佳句了。除可考察士大夫文学与民间文学的交互影响外，磁州窑“瓷诗文化”对研究金元异族统治时期南北方文化、文学交流也颇资参考。

（二）提供时代民俗信息：磁州窑“瓷诗文化”孕育、发展于民间，自然为我们提供了大量较为真

实可信的民俗社会信息。宋末金初，磁州窑器物上多见“忍”、“道德清静”等文字，反映了当时动荡社会环境中北方地区人们在女真族统治下的思想情绪。从磁州窑器表早期刻写的“福德长寿”、“家国永安”到金初多见的“忍”字，其间情绪变化很大，是社会由安定、富裕向动荡、贫困转折的真实写照。在磁州窑器表文字中，“叹世”、“隐逸”、“怀古伤今”等主题较多，明显流露出对功名利禄的鄙视和对统治者及封建正统道德的反叛，这也是那段特殊历史时期社会思想和心态的折射。日本松泽美术馆藏南宋绿釉长方形枕上刻写的诗文则更为明确地显现了宋金交战，田园荒芜，百姓流离，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时难年荒事（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途中。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无（五）处同。时余游颖川，闻金兵南窜，观路两旁，骨肉遍地，可叹可叹。为路途堵塞，不便前往，仍返原郡。又闻一片喧哗，自觉心慌，思之伤心悲叹。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只有作诗，少觉心安。余困居寒城半载，同友修枕廿有余。时在绍兴三年清和望日



图11 南宋绿釉长方形枕

安。余困居寒城半载，同友修枕廿有余。时在绍兴三年清和望日

也。”(图11)此段文字中的诗句源于白居易,后文似为落魄文人添写,其与修枕匠人“同友”,或可证明本文前述散落民间的隐逸知识分子对磁州窑“瓷诗文化”的催化作用。

(三)观摩民间艺术状态:磁州窑器表文字早期是用竹签之类工具刻划的,宋末金初时出现了毛笔书写,这是其艺术品位得以提高的重要标志。这些器表文字楷书、行楷、行书、行草较多,风格多样,天真活泼,多带有民间书写的便捷灵动性,与两宋“尚意”书风暗合。有些行楷书写稳健,落笔有度,估计系文人所为。此外,还有



图12 金代白地黑花长方形枕

杂合诸多书体的“破体书”,甚至全用篆书书写的,(如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藏金代白地黑花长方形枕)(图12),这对制瓷工匠来说,实属不易。这些宋金元人的书法为我们研究中国书法发展史特别是民间书法史提供了鲜活的第一手资料。同时,磁州窑器表与诗文并存的大量绘画也为我们研究当时社会风俗及民间绘画提供了佐证材料。

(四)考察文化传播途径:磁州窑器表书写使文学艺术在口头、书籍之外又有了一种新的传播途径。作为民窑的磁州窑其服务对象主要是平民百姓。磁州窑制瓷工匠

们将当时社会上广泛流行的或自己所学所会的诗、词、曲等作为一种装饰形式,抄录在各种器物(尤其是瓷枕)上,使不识字的人在日常生活使用器物过程中认识了字,懂得了诗词,明白了历史典故和格言警句里的含意。磁州窑器物成了传播文化的新媒体,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这对我们研究文化传播颇有裨益。

(五)关注市场营销策略:磁州窑制瓷作坊和匠人自觉研究着社会消费心理,并主动将市场营销观念付诸实践。许多酒瓶上题写的“醉乡酒海”、“清沽美酒”、“漫说杏花村”、“风吹野外十里香”等都是直接为所装美酒作广告宣传。而与用途有关的题诗,则更是通过对所盛之物的赞美,引发出内心感受,其文学性更强。如有些酒坛上书写的“闻香须下马,知味且廷(停)车”,“刘伶问酒谁家好,李别(白)迴(回)言此处高。”有的酒瓶题写“牛羊千口”,大概是为了迎合塞外牛羊贩子的需求,而题“招财利市”的当然是为了迎合普遍商人的心理。磁州窑瓷枕上则多见“张家造”、“张大家枕”、“潞阳陈家造”、“漳滨逸人造”等戳印记号,这显然是一种品牌营销了。此外,磁州窑器表所录前代文人诗词中最多的还是苏东坡的作品,这应与苏轼的社会影响力有关,表明了磁州窑作坊希望借苏轼作品来提高瓷器文化品位,迎合消费者审美需求心理,并藉此扩大自己的产品销路,获得更多利润。

此外,因磁州窑工匠文化水平有限及书写便捷的目的,他们在抄录诗文的过程中常有简写、异体等情况出现,这给我们文字学研究也提供了大量有用信息。

注释:

- [1] [6]冯先铭:《中国陶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80、382页。
- [2] 王兴:《磁州窑诗词》,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7页。
- [3] 萧湘,李建毛:《瓷器上的诗文与绘画》湖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140页。
- [4] 杨栋:《散曲文献学的新视野》,《中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1期。
- [5] 潘军:《诗海遗珠,民俗瑰宝从长沙窑器表诗文看唐代民间诗歌文化》,《长沙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